

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

姚 远

【摘 要】 非正式支持是老龄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应对老龄问题的不可忽视的举措。中国相关研究比较薄弱。为了推进该项研究,文章从6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外学者研究非正式支持问题的状况及其主要观点。

【关键词】 非正式支持 理论 研究 综述

【作 者】 姚远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

在谈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时,人们常常提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概念。对于正式支持,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而非正式支持方面的研究,则屈指可数,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为了推动对非正式支持问题的研究,本文将分6个方面阐释有关非正式支持问题的理论和研究。

一、什么是非正式支持

非正式支持有多种表述。比如,非官方社会支援(N. R. 霍曼等,1992:295)、非正规制度(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31)、非正规照料(A. Nocon, M. Pearson, 2000:341~367)等。所有这些概念都突出了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的本质区别,即没有政府的直接性干预行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1996)认为,没有政府干预且极少有市场干预的收入保障非正规制度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主要保障形式。

非正式支持的形式,从资源角度可以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第二类是亲属(兄弟姐妹及远亲、姻亲等)对老年人的支持。第三类是非亲属对老年人的支持。非亲属又可以分为两个子类,一类是邻居、朋友、同事等;另一类是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也有学者将家庭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并列,作为第三种支持形式(哈尔·肯迪格等,1997:8)。在提供支持方面,

前述三类支持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基于西方个性文化的氛围,西方国家老年人比较重视朋友、邻居的作用。英国学者 A. Nocon 等(2000)认为,朋友、邻居的个性化关怀和照料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基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中国老年人则比较看重家庭成员的作用。费孝通先生(1998)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非正式支持所遵循的近亲-远亲-朋友、邻居-社会的关系序列。文化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有西方学者认为,如果邻居中存在着种族或等级观念,那么,白人很少会去照顾有色种族的老人(S. Liffé, 1998:24)。这就是说,在非正式支持的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种异层次间的疏离或同层次间的亲和。

非正式支持也可以从整体角度进行类型界定。按照文化背景,可以区分为与家人生活的中国互置型(有学者称之为交换型)、与同代人生活的西方国家独立型、与长子生活的日本合居型等。英国学者珂莱尔·婉格尔(W. G. Clare)等(1998)根据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当地有无近亲成员,与家庭、朋友、邻居交往的密切程度,与社区和志愿者的互动水平)归纳了五种社会支持网类型,即家庭依赖型(与家人交往密切)、社区整合型(与家人、朋友、邻居交往均密切)、自我涵括型(与家人、朋友、邻居有交往,但均不密切)、社区依赖型(与朋友、邻居交往密切)和自我局限

型(与任何人均不交往)。这五种类型将非正式支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对于认识非正式支持的功能和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非正式支持有哪些功能

有关非正式支持功能的分析,没有太大的差别,仅仅是在研究和表述方面存在着角度和深浅的不同。研究者常常将非正式支持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联系在一起。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一般侧重在关系的阐述,而非正式支持研究则侧重于功能的分析。

就非正式支持整体而言,其功能表现为多个方面,经济支持功能、情感支持功能、生活照料功能等(哈尔·肯迪格等 1997:7)。多项研究表明,对于老年人来说,家庭是社会救助的主要来源。在老年人失去社会参与的主要条件以后,非官方的社会援助可以满足老年人感情上的需求。对于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某些消极后果,家庭、朋友、邻居甚至诸如杂货店伙计和邮递员这样的熟人,都可能成为有效的缓解手段(N. R. 霍曼等, 1992:296~297)。更深入的研究表明,非正式支持的功能因其形式和类别而有细微的差异。

家庭支持是非正式支持中的主体(张友琴, 2001)。其功能表现为一种全方位的支持。首先,家庭支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家庭支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情感上的慰藉。二是可以满足老年人经济和照料方面的需求。近亲倾向于在老年人生病时提供主要帮助,远亲则使老年人和社会保持联系。能否得到家庭照顾往往是决定一个老年人住进养老院还是住在家里的的重要因素(N. R. 霍曼等, 1992:297)。三是老年人在被赡养的时候还能够帮助和支持家庭成员,有助于调整代际关系(姜向群, 1997)。其次,家庭支持有利于推进健康老龄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注重家庭团结、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养老方式长期以家庭支持为主。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高,其活动范围不断缩小。他们更愿意从家庭方面获得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此,家庭支持是衡量“健康老龄化”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陈小月, 1998)。再次,家庭支持还具有

巩固传统反哺模式的文化价值。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核心家庭以亲子关系为重,反哺式为主,一个个形式上独立门户的小家庭,通过家庭网络关系紧密相连为‘一家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相辅相助。这种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家庭网络关系,有助于发扬中国家庭的反哺模式”^①。

有关研究(A. Nocon, M. Pearson, 2000; F. Thomese, T. V. Tilburg, 2000)显示,朋友和邻居是老年支持体系的重要部分。首先,朋友能够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在朋友的关爱与交往中,老年人的信心和自我认定可以得到提高,并获得一种心理—社会的依靠。以鼓励、体贴和交谈为形式的支持有助于保持老年人的个性和价值意识。其次,朋友和邻居能够提供安全感的、灵活的和反应迅速的支持,而不像正式支持那样过于规范和反应迟缓。第三,朋友和邻居在提供广泛的和经常性帮助的同时,还在联合其他服务方式方面扮演了一种沟通的角色。第四,朋友和邻居能够帮助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直接促进了老年人与社会的融合,提高了老年人再社会化的程度。第五,朋友和邻居的助老行为能够得到其家人的帮助,有利于调整帮助者的心态和例行的照料任务,从而巩固照料者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

非正式支持功能还会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对老年人的照料,在尼泊尔,么儿子是最适宜的照料者;在印度,已婚儿子是最适宜的照料者;在美国,爱尔兰裔家庭采取不让女儿结婚的方式来让她作为照料者;在中国,却是鼓励儿子结婚,让儿媳成为照料者(J. 基恩, 1994)。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家庭养老依然存在着,本身就说明了文化的力量。但是,文化的作用形式可能是不同的。在发达国家中,老年人喜欢独立生活,子女们也因事业与父母分开居住。但这并未影响代际间的支持。研究表明,50%的老年人有一个住得很近的子女,80%的老年人能够经常与子女见面或电话联络。在老年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绝大多数老年人有子女能够及时赶到或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照料。所以,感情

^① 《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问题学术讨论会纪实》,《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1期。

上的距离似乎比地理上的距离更重要,大多数成年子女觉得和他们父母的关系“密切”,尽管住得很远(N. R. 霍曼等,1992:308)。在部分发展中国家,联合家庭或大家庭依然是一种主要的居住形式。其中有经济或居住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习俗、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原因。与亚洲相比,非洲的养老制度建立在更广泛的家庭概念的基础上。家庭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联合家庭,还包括多妻制的家庭,几个妻子与孩子们共同生活。子女的概念也很宽泛,亲生、收养、寄养、过继的都是自己家庭的子女。家庭养老就是在这种家庭中由这些子女共同承担着。虽然非洲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也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迁移并未给家庭养老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迁移是循环的或暂时的。习俗的力量使非洲家庭养老制度运转得很好,大家庭成为赡养老年人的主要形式(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在儒文化圈中的亚洲国家,“孝”观念依然成为国家提倡的传统美德,也是维系代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三、非正式支持是如何运行的

关于非正式支持的机制问题,《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1996)就家庭成员支持提出了四种观点:一是情感机制,即家庭成员的情感转移和利他主义。老年人的幸福就是家庭的幸福。二是荣誉机制。在信息公开化的社区或家族关系网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会对家庭荣誉产生直接的影响。三是规范机制。宗教和家庭提倡的忠孝观会成为子代的行为规范。四是利益机制。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迟早也需要子女的赡养。有学者认为,亲属间的照料受到亲属关系、居住距离和情感深浅的影响(S. Liffé, 1998)。

朋友、邻居等非家庭成员的支持,其动机也是多样化的。有学者总结了6个方面(A. Nocon, M. Pearson, 2000):一是天性;二是信念;三是宗教;四是价值观;五是环境;六是心理满足。

有学者认为,前者偏重于一种职责意识,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性意识或人类的博爱之心。

尽管非正式支持主要依靠情感的道德的非

利益机制维系,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依然不能不考虑利益方面的因素。因为照料者毕竟是在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还要牺牲工作收入及自己的家庭责任。特别是对于长期照料者来说,机会成本、情感成本的损失就会更大。因此,适当地进行经济补偿或政策支持,对于调整支持双方的关系和保持非正式支持功能是十分有利的。

有关非正式支持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其一,地理距离论(F. Thomese, T. V. Tilburg, 2000)。就非正式支持资源的整体情况而言,地理距离是个人建立关系网络方面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距离越近,网络成员越多;住得越近,网络成员之间的接触也越频繁。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共同的邻居关系能够推动居民相互联系的论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在分析城市化对个人邻居网络影响的问题时,这个被称之为“社区问题”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论主要适用于朋友邻居关系,不适用于亲属关系。因为影响亲属(父母、岳父母、配偶、子女、女婿、儿媳)关系的因素主要是血亲关系规律而不是地理距离。

其二,功能区分论。该理论认为,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是不互相替代的。非正式支持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其具有3个正式支持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功能。(1)应付意外事件。面对老年人半夜犯病或外出摔倒等突发事件,规范的正式支持常常不能及时发挥作用,只能依靠家庭成员或邻居的帮助。(2)应付大量的非规律性需求。老年人的需求常常是非规律性的、偶然性的。作为专业的、程序化的正式支持,很难满足老年人的这些需求。而非正式支持则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能够满足老年人随时随地的要求。(3)应付无法细分的工作。老年人的要求多种多样,一个需求常常涉及经济、劳务、心理、情感等多个领域。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正式支持或者帮助料理家务或者帮助外出照料或者陪伴读书,不可能兼及其他。基于情感或责任的非正式支持则可以根据需要同时进行多方位的工作,在劳务帮助的时候又对老年人进行心理调节等。所以,在考虑采取何种支持时,有必要首先搞清楚正式支持和非

正式支持所承担的不同功能(E. Litwak, 1985: 9~10)。

其三,平衡协调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1)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功能具有互补性。实现互补才能真正达到帮助老年人的目标。(2)互补就是在两者间找到平衡点或中间点。平衡点的实质在于既能实现互补,又能保持各自的优势和个性(E. Litwak, 1985:16)。

其四,5个假设。(1)城市化程度与邻居网络规模成反比。(2)邻居流动水平与邻居网络规模成反比。(3)同质性有利于邻居网络规模。有学者认为,贫穷源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原因,所以低收入户在邻居关系中缺少同质性或综合性,低收入户的聚集会对邻居网络的相对规模产生消极影响。(4)同辈人有利于邻居网络规模。有学者提出,邻居关系中有较多可用的同辈人,会促进较大的邻居网络。(5)邻居网络可能形成老年人对环境的依赖。邻居特征对老年人的邻居网络的相对规模影响越强,老年人的收入和身体能力越低(F. Thomese, T. V. Tilburg, 1985)。

四、非正式支持有哪些主要特征

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是两种支持资源。尽管很多研究结论认为,非正式支持的作用逐渐下降,正式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强。但是,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C. E. Swane, 1999:49~53)。两者各有所重(地位)、各有所为(功能)、各有所需(需求)、各有所依(条件)(姚远, 2001:175)。这是因为非正式支持表现出一些正式支持不具备的特征。

其一,初级群体奠定了非正式支持的资源基础。初级群体又称首属群体、直接群体或基本群体(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1991)。按照群体联系的方式,初级群体主要由血缘(亲属)、地缘(邻居)、友情缘(朋友)、业缘(同事)等关系所构成。在当代社会中,慈善机构、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俱乐部等也成为非正式支持的基础(世界银行编写组, 1996)。

其二,人际关系和情感原则推动着非正式支持的运行。每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既要从社会中获取他人的帮助,又要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支持。这种帮助和支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人与社

会组织的关系,二是个人与初级群体的关系。就个人来说,后者提供的思想情感交流、心理精神沟通、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或帮助均是建立在长期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1991)。所以,美国社会学家C. H. 库利在其《社会组织》中提出,初级群体是亲密的面对面接触和合作的群体(郑杭生, 1994:203)。正是这种亲密关系奠定了非正式支持运行的动力基础。正式支持是一种制度性、政府性行为,参与者受法律的约束。而非正式支持则是一种自愿行为,主要受社会道德、舆论、习惯等规范的约束(世界银行编写组, 1996:47)。

其三,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支持构成了非正式支持的基础和核心成分。非正式支持是一种层次性的网络。父母—子女关系处于核心位置,其他关系则处于围绕该核心所形成的不同层次。位置和层次不同,表明关系的亲疏不同,支持的力度、范围、尽心程度均会有所不同。父母—子女关系是其中最亲近、最尽心、最有保障的支持。有关家庭养老问题研究指出,子女支持奠定了亲情关系的基础,奠定了资源供给的基础,奠定了基本支持模式。朋友、邻居、同事及社会志愿者等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实际上均是子女支持的放大和扩展。父母—子女关系是非正式支持中最有活力的支持性因素(贺寨平, 2001)。

其四,非正式支持依据机能状况而非年龄进行援助(世界银行, 1996)。当正式支持将年龄作为提供资助或帮助的依据时,非正式支持提供者则更多地关注被帮助者本身的情况。

其五,非正式支持主要是女性在工作(熊跃根, 1998)。正式支持是制度化的工作,提供者的性别不受限制,年龄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非正式支持则大多由中年女性或低龄老年女性承担。所以,妇女高就业率不利于强化非正式支持,但有利于推进正式支持。研究表明,女性无偿的家庭照料能够增强被照料者的幸福感(C. E. Swane, 1999:49~53)。对于如何看待女性主要承担家庭支持,也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有研究表明,非正式支持对妇女及其发展是不利的(世界银行编写组, 1996)。

其六,非正式支持一旦削弱或被排挤,要恢

复是很不容易的(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非正式支持的基础不是法律和交易原则,而是情感、关系和道德感等。这些基础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或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一旦被破坏和排挤,一旦融入了非情感的东西,要恢复是很难的,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其七,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保持接触和互动。非正式支持与正式支持有根本性的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水火不容。多项研究表明,非正式支持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依然需要正式支持的帮助。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离开了政府的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也是独木难支的。韩国学者 S. J. Choi(1996)认为,强化非正式支持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正式支持体系和网络的建设。中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日本的《老年人福利法》、法国和瑞典的老年人福利政策(谢联辉等,1998:368~463)、荷兰的《照料者法令》和《照料者和残疾儿童法案》(A. Nocon, M. Pearson, 2000:344)等都表现出对非正式支持制度的支持。

五、如何估计非正式支持的发展前景

对于非正式支持的前景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鉴于非正式支持的特殊功能,非正式支持是需要的,应该保留非正式支持,并有所强化(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32)。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正式支持已呈现出削弱的趋势。那么,如何认识处于需求和削弱这对矛盾中的非正式支持呢?一项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的比较研究指出,大量调查数据显示,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没有失去其独特的作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家庭依然承担着赡养老人的重任(边馥琴等,2001)。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家庭关系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弱。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家庭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

有关研究指出,非正式支持的存在前景有赖于政府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强化非正式支持的政策和机制。西方学者认为,成年子女对其父母不负有法定赡养责任的政策会损害家庭支持的功能,不利于推进非正式支持(C. E. Swane, 1999:49~53)。

研究表明,非正式支持具有可塑性(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32)。有学者认为,适应性变化是非正式支持得以维系的生命所在(姚远,2001:161)。因此,鼓励或推进非正式支持的变化,也是强化非正式支持的重要举措。这些变化可以具体归纳为几个方面:

其一,货币支持替代亲侍支持。非正式支持的特点之一是人际间的面对面的支持。但在工作压力和社会流动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子女或亲属很难像传统社会那样“侍奉不离”。在社会服务体系日臻完善的条件下,子女或亲属通过支付货币而换取社会服务以保障老年人所需要的非正式支持,成为可能。

其二,提高自我养老能力有助于缓和正式支持的压力。非正式支持包含着需求和支持两个方面。需求提高了,支持的压力就会增大;需求减少了,支持的压力就会减弱。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心理调适水平、经济保障水平、自理自立水平提高了,就会减少对非正式支持的依赖和需求,从而减少非正式支持的压力。

其三,建立适应非正式支持变化的文化机制。传统社会强调“儿子养老”,这就限制了扩大养老资源的渠道。如果女儿也可以养老,特别是赡养娘家父母,就会使非正式支持资源扩充一倍或几倍。

其四,倾斜的经济政策。财产继承应该向承担养老责任的子女或亲属倾斜。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真正承担养老责任的邻居、朋友、同事等也应该享有财产继承权。

在充分肯定政策作用的前提下,为非正式支持者提供科学信息、社会支持和社会承认也是很重要的(S. Liffie, 1998)。科学信息包括诊断、药品及其疗效、服侍知识、处理失禁或行为变化等方法、专项服务知识、社会支持组织名单等。社会支持是指社会机构对照料者的帮助。非正式支持中的照料者有两类。一是晚辈对长辈的照料,二是同辈人之间的照料。前者,由于事业、家庭等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全身心地照料别人,因此需要社会的支持,以履行事业与照料的双重责任。而后者,作为同辈人,有的上了年纪,在照料别人的时候,也会出现身体

不适、生病、孤独、贫困、疲倦、焦虑等问题,特别是在双方沟通发生阻滞时,更需要社会的帮助。对非正式支持者的社会承认主要通过法规和政策来实现。

六、中国学者有关非正式支持问题的研究

对非正式支持问题,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如齐铤(1998)采取定量分析方法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进行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熊跃根(1998)认为,在老年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中,子女是一个重要基础,特别是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该项研究采取小组访问的定性分析方法。张友琴(2001)以1996~1998年间对厦门市城区和农村老年人生活与供养状况的两次大型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重点探讨了与社会支持网有关的理论问题。(1)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结构性质差异和网络规模差异,主要集中在经济保障、生活照顾、精神慰藉三个方面。(2)探讨网络测量指标的改进。(3)通过分析社会支持的网络规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探讨社会支持网的功能。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1997)在文章中介绍了一种关于老年社会支持网的分类方法,同时运用实证和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北京老年人不同社会支持网的特点。

总之,非正式支持是老年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非正式支持问题终将会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 N. R. 霍曼等(1992):《社会老年学——多学科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世界银行编写组(1996):《防止老龄危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 哈尔·肯迪格等(1997):《世界家庭养老探析》,中国劳动出版社。
4.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5. 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1997):《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社会学研究》,第2期。

6. 张友琴(2000):《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7. 姜向群(1997):《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人口学刊》,第2期。
8. 陈小月(1998):《“健康老龄化”社会评价指标的探索》,《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9. J. 基思(1994):《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老年人的照料——一种人类学的思考》,《老龄问题研究》,第11期。
10. 姚远(2001):《中国家庭养老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第175~176页。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199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2. 郑杭生(1994):《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3页。
13. 贺寨平(2001):《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
14. 熊跃根(1998):《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社会学研究》,第5期。
15. 谢联辉等(1998):《联合国老龄话题文件总汇》,华龄出版社,第368~463页。
16. 边馥琴等(2001):《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17. 齐铤(1998):《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A. Nocon, M. Pearson (2000), The Roles of Friends and Neighbours in Providing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eing and Security. 20.
19. C. E. Swane(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and Formal Care. Campbell & Ikegami. Long-term Care for Frail Older People: Research for the Ideal System. Spring.
20. E. Litwak (1985), Helping the Elderly: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Formal Systems, Guilford Press.
21. F. Thomese, T. V. Tilburg (2000), Neighbouring Networks and Environmental Dependency. Ageing and Security. 20.
22. S-J. Choi(1996), The Family and Ageing in Korea: a New Concern and Challenge. Ageing and Society, 16,1-25.

(责任编辑:朱 犁)